

特别策划

父亲的背影

失业

杨文灿

四月的西安烈日炎炎,身处人潮拥挤的火车站,我更加怀念家乡。这个季节,家乡小路正绿树成荫,清风温润。

狼狈不堪地挤上火车,双手早已被行李带子勒得通红,豆大的汗珠不停从额头滑落。火车终于驶离古都西安,我的心情也如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凄凉而又荒芜。

唯一能给我焦躁的内心带来欣喜的是,昨晚父亲打来电话,说自己难得有假期,要回家休息几天。这两年父亲到外地工作后,回家少之又少,而我能和父亲假期重合,共同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父亲这些年着实吃了些苦头,两鬓早已斑白,曾经伟岸挺拔的身躯竟有些佝偻。

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原本在领导岗位工作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自行择业的个体户。经过短暂迷茫后,父亲和几个老同事开始创业。

然而,对这位老同志,市场没有给予丝毫怜惜:它像一只大手,慢慢托举你,让你初起见色时,又狠狠将你拍下。合伙人各自离去,积压的大宗商品价格一路狂泄。

父亲整宿整宿失眠,白天见客户,见老同学,见老同事,见所有能够带来一丝希冀的人,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惨遭资本市场洗的厄运。父亲,再次失业了。

那年正值我大学毕业,在家待业的父亲仿佛一下苍老了十岁。不再参加聚会牌局;不再在亲友聚会上高谈阔论;不再连出门倒垃圾都对衫革履了。

如果说第一次失业,让父亲从养尊处优回归平凡生活,有的仅是心理落差;那么第二次失业,则把父亲对事业的骄傲、自信彻底消耗殆尽。

记忆里的那个夏天,压抑、冰冷,有着深灰色调:络绎不绝的至亲,母亲的劝解话语,甚至于我也会模仿电视剧里的对白,讲上半天东山再起。只是后来我才明白,对于承受莫大创伤的父亲,每次心怀善意的“怜悯”,也只不过是残忍地揭去旧伤疤。

再后来,父亲学着社区里的老人,开垦了一块菜地,每天鼓捣菜园也要花上半天时间。我不理解,认为父亲这是在逃避、沉沦。几次激烈的争吵过后,父亲依旧挑着扁担,挂着两个紫红的破桶,去菜园浇水。

再次接到母亲的电话已是夏末秋初的十月:“你爸爸出去打工了,昨天走的,本来他不让我告诉你。”我心里咯噔一下,五味杂陈,感觉仰望的一座丰碑轰然倒塌。拨通父亲的电话,熟悉的声音传来:“也不算打工,你叔叔开了个公司,我过去给他帮帮忙,不告诉你,怕你有想法。”挂断电话,泪水夺眶而出。父亲讲得云淡风轻,可我分明听到了电话那头轰鸣的工程机械声。

如今父亲已外出近三载,工作几经调换,从事着基层技术管理工作,拿着不错的报酬。每每与父亲通话,他总是一副老骥伏枥的姿态,说是为了我和母亲还能再奋斗50年。现在我才明白,那年十月在内心崩塌的不是父亲的形象,而是我那可笑的虚荣心。

列车向着父亲所在的方向奔驰,待我回过神来,车窗外已是满山苍翠。连绵不绝的丘陵,壮阔却不突兀。我的心也跟着轻快起来。我盼望着快点到家,早点见到父亲。或许见面之后的交流依旧不多,但这辈子有父亲一路同行,真好!

坚韧、果决、刚强……

每当我们提到父亲,似乎总也绕不开此类形容词。在各类艺术形式中,父亲的正面形象也常常与此相关。但实际上,父亲作为普通又普通的凡人,在时代的裹挟中,同样需要承受生活环境的挤压。唠叨、受挫、颓丧、疾病、穷困、儿女情长……这其实也是父亲必须经历的另一面人生。今夏,又一个父亲节将至,对于父亲以及父爱光辉的“背影”,我们是否又应该有不同的思考?

唠叨

平晋恩

父亲是老兵,经历了5年超期服役后退伍。印象中,父亲的话很少。小时候放学回家,往往是 he 练他的毛笔字,我看我的书,互不打扰;一起看电视,父子也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有时,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捡来的。母亲开导我:“你爸在部队里受的教育就是‘多干事、少说话’。”

父亲的话由少到多,乃至于变成唠叨,发生在我参军入伍之后。以前,手机没有普及,每到周末我用电话卡往家里打电话,他抱着话筒一说就是十几分钟,内容涵盖范围极广;做事要谦虚,睡觉要平躺,清早要喝水,天凉要加衣……每当这时,我总是百无聊聊,或者长时间沉默,或者边听电话边忙手头的东西,偶而也应付两声。

2009年,所在部队纳入国家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多次参与大型抢险救灾,频频在电视上亮相。之后,父亲的唠叨更勤了,随时可能随着手机铃声响起。与往年不同,如今的唠叨里有深深的担忧。福建泰宁泥石流,父亲的电话如期而至:“别又像去年,要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你,都不知道你去灾区了……”父亲的唠叨依然刹不住车。只是如今,握着手机,我早已眼眶润湿。人到中年还有老父亲把自己当作长大的孩子,这得是多么的幸福。

当兵的我俨然成了老父亲的骄傲,唠叨也不再仅仅限于父子之间。每当客人来家里,甫一落座,瓜子、茶水上桌后,父亲就开始口若悬河地谈起“部队的儿子”。后来我不得不提醒父亲,部队的事情不能乱讲,父亲宣传儿子的欲望方才压抑不少。

18岁当兵离家,考军校,成为军官,调入机关,再到自己也有了幸福的家庭……父亲的唠叨一路相伴。今年春节回家,我偷偷地望着餐桌中央正襟危坐的父亲,发现他白发满布两鬓。我突然就害怕起来,害怕父亲再也不对我唠叨。



苗青摄

穷困

韩玉洪

生长在长江边,又在船上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曾经“御穷穷困”。两年前,病重的父亲留下遗嘱:死后一定要把骨灰撒到长江里。

我在殡仪馆接过沉重的骨灰盒,差点失手。在老家江边打开骨灰盒,才发现里面哪里是骨灰,分明是潮湿的灰色骨块。我将这些骨块伴着玫瑰花撒进三峡库区,思绪也随之进入百米深的旧洲河,想起第一次见到父亲灰色骨块的惨景。

上世纪50年代末冬季的一天,父亲拉纤后回家,上身裹着破棉袄,下身穿件黑单裤,提一堆小娃子的新衣服,打着赤脚踏进了吊脚楼,两个脚后跟都裂开一寸多长的口子。父亲坐在靠椅上,双脚搁上长板凳。母亲抱起父亲的双脚,用扎鞋底的粗线缝裂口,泪水打湿索子线。年幼的我立在一侧,依稀窥见布满黄色老茧的裂口中隐隐透出灰色的骨头,吓得浑身直哆嗦。

父亲却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这酒不是酒,它是靴子血!”又夹起一筷子腌干子皮说:“这菜不是菜,它是靴子肉!”接着开始向我讲述当初杀鬼子的故事。母亲说:“这酒本来就不是酒,是农药蒸馏出的苦水。”住在江边,我家每年都要从山上石头缝里刨土出来种红苕苞谷。天干庄稼旱死,下暴雨连土带庄稼都无影无踪。填饱肚子的年月,怎会拿粮食去酿酒?

狂风袭来,吊脚楼楼顶像筛子一样晃动,密麻的细沙从瓦缝钻出无情地倾泻。你说,这风刮得,怎一个“穷”字了得。狂风中,江水在河床里东奔西跑,好像在打架。夏天,浑浊的热水打落岸坎,拍打吊脚楼的木桩桩;冬季,雪亮的寒水抽打江中的礁包卵石。愤怒的江水冲进峡谷,把疾风逆势挤出来抓些青沙抛上天,电线乱弹琴,竹涛如嘶哑。

父亲考进长航,请了三天假搬往宜昌。我们全家上了爬子(即木排)。从高处望去,爬子就像江上挪动的爬爬虫:木排前后绑的梢板像头尾,两边安了许多大桅片像长腿。父亲和船工们一起扳梢推桅。

傍晚,爬子打赢那些好斗的江水出峡。父亲和一个叔叔上了小木船急速划浆,箭一样射向宜昌岸滩,登岸后立即扔桨踩翻小船,把爬子拉上岸,也把我家拉出了经年的穷困。

面子

王能福

父亲节快到了,看着一双儿女耍着小聪明攒钱,悄悄为我准备礼物,我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辛苦劳作一辈子,如今年过七十,仍然留守在贫瘠的鄂东南革命老区农村,田间耕作。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老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这种“爱面子”也波及到村里那条土路上——对它,父亲容不得一点指责。而小时候的我屡屡以“破路”称之,这无疑伤了村路的“面子”,也触犯了父亲。

1984年,我10岁,家乡的那条村路纯粹到只有泥土。乡亲们走在村路上,晴天一身土,雨天双脚泥。一天,父亲带我去镇上买了双白球鞋,兴高采烈的我迫不及待穿上新鞋。回家路上,一场大雨让白鞋变成了黄鞋。“这破路,我再也不想走了!”

看到我恨恨的样子,父亲二话不说,把新鞋子借雨水冲洗干净。“鞋子脏了,可以洗干净;路不好,可以修得像城里的沥青路一样;但是话要是说出去了,就不可能收回嘴里再说一遍!”

十年后,村路上铺了粗细不一的石子。当年高考失利,我决意离开家乡走进军营。离家时,身穿新军装,戴着大红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着。20岁的我意气风发,不想却一脚踩进了村路积水坑的泥浆里,忍不住开口抱怨:“真希望再也不回来走这条破路了!”

父亲听到这句话,脸色有点难看。到部队后,父亲的第一封信就写道:“仔呀,世上最好的路莫过于家乡的路,你可以修好它,但不能嫌弃它,因为没有它,你回不了这个生你养你的家乡呀。”

二十年后,我已30岁。常年军旅漂泊,那条村路的记忆早已模糊。一天,父亲来电话说,村里要修沥青路,希望我能出点力。我寄出了1200元,是要求集资数的3倍。父亲收到捐资后很高兴,说乡亲们都对他说大拇哥。

转眼之间,我已到不惑之年。从部队转业后,我成了一名交通人。恰逢父亲70大寿,我们一家回乡探亲,赶巧村里在商讨改造村路。从村里走出去的打工仔、公务员、企业家都纷纷慷慨解囊,父亲也很热衷。按风俗,当地庆祝老人的70岁生日,需要购买8000元钱的烟花爆竹,意思是祝老人活到80岁以上。临办寿宴前,父亲召集儿女们说:“买烟花爆竹的钱,你们就不要花了,都捐出去修路吧,既环保还做了好事。”

水泥路修好后,村里为捐资人修建功德碑。父亲虽然不是捐钱最多的人,但名字却赫然排在第一位;几十年后,父亲与村路的“面子”终于合二为一。

合墓

李晓

“我会得啥病,根本不会嘛!”父亲拍着胸脯大声说。这是父亲75岁生日那年,在客厅里对我夸下的海口。

只是后来,守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我才发觉,就在父亲“说大话”的那天,疾病早已鬼鬼祟祟地在他身边埋伏了许久。终于一天半夜,侵入了父亲的身体,彻夜疼痛。CT检查发现,父亲的背部凝结了一团阴影。而那团阴影此后便罩住了整个家庭:看晴朗天空的阳光,也白花花地犹如笼罩着一层雾气。

医院沉闷,空气似乎也是凝滞的。父亲和母亲在病房里,度过了大半年的时光,母亲则会沉默无言。父亲歪过头来,望着母亲,母亲把手伸给他握住,父亲转而塌实地闭上眼睛睡去。有天,父亲对母亲开口:“我哪天走了,你还是去学学跳舞,院子里那些老头儿,都是你的伴儿。”母亲一下子火了,站起身,冲出门外,伏在墙上,“呜呜呜”哭出声来。

到了今年春天,父亲第四次入院治疗,全身僵硬,腿疼得不能下地行走。他说自己胸口像是堵着,吃不下任何东西。母亲一小口一小口地给父亲喂汤,父亲又婴儿吃奶一般吐了出来。母亲着急:“老头子,使劲吃啊。”父亲半闭着眼睛,有些委屈:“我吃得下,还不吃啊?”

朋友劝我提前把父亲的墓地选好。在老家的乡下,还有提前选好墓地、打好棺材“冲喜”的说法。一位友人恰好是一家公墓的负责人,他陪我在古树参天的墓园选了一处合墓。那里面面对山脊,斜眺江水。

我把为父亲选好墓地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大叫一声,抓住我的衣袖往病房外扯:“你就知道你爸要死啊,你这个当儿子的,这么绝情啊……”母亲激动得双肩抖动起来。母亲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似乎那天,她才意识到,终究每个人都要离世,父亲也不例外。

我又悄悄告诉母亲,为她和父亲选了合墓。母亲再次激动了:“老头儿脾气怪,我死了还和他在一起啊!”想起有天母亲丢了一根针,吵着和父亲离婚。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像孩子一样抽泣。

选墓地的事,父亲一直不知情。虽然常把生死挂在嘴边,一副视死如归的作派,其实还有许多心愿未了的父亲最害怕死:要和母亲去新疆看表叔;要把家里老照片归拢后,自己写文字出书;要亲眼看到孙子的婚礼……

什么事都不瞒着父亲的母亲,最终还是是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实情。如有神助,缠绵病榻许久、极度虚弱的父亲竟一下坐了起来,大声重复着:“我这个儿子,有孝心!”父亲把头靠在母亲怀里,半闭着眼睛说:“我俩死了,也在一起作伴儿……”

东海救助局:惊涛骇浪里的安全卫士

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
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交通救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

本报记者 姜秋华
特约记者 萧蒲州 通讯员 刘占强

逐梦东海生死演绎大爱,无私救助亮剑危难勇担当。作为一支国家海上专业救助队伍,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全力以赴为海(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驾护航”。从江苏连云港到福建东山岛,在绵延7200余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东海救助局承载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守着对生命的大爱,在执行重大应急救援抢险任务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惊涛骇浪间的一次次成功救助,生动诠释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下潜!为了我的船员兄弟

“船员兄弟已经被困在漆黑的水下长达三十几个小时,虽然救助过程很危险,但是作为一名东海救助人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带他回家!”在东海救助局近日举行的“党员大讲堂”上,该局应急响应救助队共产党员唐顺杰回忆营救“苏赣渔运02886”船时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惊心动魄的救助时刻早已定格多日,但是唐顺杰娓娓道来的话语,再次感染了所有听众的心。

在关键时刻,唐顺杰挺身而出,用专业技能和忘我的精神,成功营救翻扣船的遇险渔民,这正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在东海救助局涌现出来的优秀榜样。

2015年11月28日,对于江苏省赣榆县青口镇下口村的村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世代以打渔为生的他们,那一刻心都悬在半空。

36个小时已经过去在了,他们的兄弟被翻扣的“苏赣渔运02886”船压在了距启东吕四大洋港约150海里的地方,他们知道,这次肯定凶多吉少。

他们不知道的是,唐顺杰此刻刚刚和5名队员带着设备乘救助直升机降落在守护着“苏赣渔运02886”船的“东海救101”轮上。

但留给唐顺杰的时间已经不多。据预测,6小时之后,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到时翻扣的渔船随时可能沉没。而救助现场,水流湍急,渔网和杂物同样威胁着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将心比心,谁没家人?那位兄弟正值壮年,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他走了,一个家就毁了。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关键在行动,危险面前要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唐顺杰立即下潜。

面对船舱内崩塌的墙壁和早已因外力而折断的各种管路,唐顺杰小心翼翼地潜行,看不清就靠手一寸寸探摸。

“最大的困难是救援通道太狭窄,勉强能供一名成人通过。而那位兄弟在承受了长达36个小时的死亡恐惧后,敢不敢一个人过去,都是未知数。”为了保证遇险者的生命安全,唐顺杰没有犹豫,毅然脱下自己的氧气面罩戴在了渔民头上,这意味着他要在无法和水面人员通信的情况下,完成救援任务。

“我被卡住了,动不了了,那个人也不见了,救命啊!”遇险渔民很慌张。而难船此时受到涌浪的不断冲击,翻扣船浮态在不断变化。水面保障人员事后回忆,当时难船船头抬高20厘米,船体右倾角度加大,随时可能沉没。

“你不要急,因为机舱入口小,两个人不能同时过,潜水员先通过,他在机舱外拉你,你拉住供气软管往机舱出口移动。”

此时已经出舱的唐顺杰在发现渔民没有跟出来之后,果断抛弃信号绳这根“生命线”,返回通道将遇险者一点点往外拉。

“当时我使用的自携式装具气瓶出现余压

不足,呼吸阻力逐渐增大。”面对生死危机,唐顺杰没有退缩,训练有素、业务精湛的他,不断调整位置,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将遇险者拖离难船并成功托举出水。

消息传来,下口村村民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成功救援“苏赣渔运02886”船,让唐顺杰获得了“2015年IMO海上特别勇敢奖”的提名,但是唐顺杰却认为,他只是东海救助局一名普通的应急队员,这份荣光属于这个可爱的大集体。

“小班子”有大动能

救助船船员是执行救助任务的人才基础,他们常年漂泊在外。如何通过党建工作提升救助船科学化管理水平,进而最大限度发挥船员们在执行重大救助抢险任务中的效能?

结合“两学一做”,东海救助局党组通过落实船员相对固定的管理方式,坚持把党支部建在船上,不断加强船舶“小班子”建设,实现了船舶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要求。

“把党支部建在船上,让‘小班子’有了大动能。我们的船员,尤其是党员同志,在执行重大救助抢险时,责任感更强了,面对危险都抢着往上冲。”成功救助失控散货船“金海西”轮22名船员的“东海救117”轮船长徐卫国深有体会。如今,“东海救117”轮上25名救助精英在救助抢险工作中成长起来。他们和徐船长一样,拥有高昂的斗志、精湛的技术、忘我的精神,展示着共产党员的风采。

今年3月9日,狂风暴雨袭击东海,海面风力9到10级。

散货船“金海西”轮由于主机故障,受寒潮大风影响,正不断接近海底沉船和中日海底光缆,

情况十分紧急:如果刚上沉船可能造成船毁人亡;如果刚断光缆,有可能造成国际通信中断。

此时,抵达现场的“东海救117”轮,像沧海一粟,在狂风巨浪中上下颠簸,单边横摇到40多度。久经风雨的船员们身体紧贴着舱壁,忍受着晕船带来的痛苦,实在忍受不住,就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袋子一吐为快。

而在驾驶台这个全船晃动幅度最大、最容易晕船的地方,已经18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徐船长临危不乱,不间断地与遇险船舶进行沟通,安抚难船船员情绪。

救助船在狂风巨浪中剧烈摇晃,与难船越靠越拢,上下交错,此起彼伏,落差巨大。经过船舶小班子紧急商议,身经百战的他们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救助方案。

徐船长凭借过硬的操船技术,牢牢将船控制在“金海西”轮下风处,两船靠近时激起的7米多高夹浪,随风重重砸在“东海救117”轮甲板人员身上,任凭冰凉的海水钻进身体,他们依旧毫不退缩。

在船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缆绳带妥,难船正式进入拖带航行作业,而此时距离海底沉船仅有0.5海里。

密切配合 同心戮力

气同则从,声比则应。每一场救助都是一次团队协作作战的考验。为了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东海救助局党组坚持以“书记队伍、党务干部队伍、党员队伍”三支队伍为基础,通过开展“融入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融入干部队伍建设 and 人才培养、融入科学管理、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示范效应进一步显著,救助船团队协作能力持续提升。

5月8日,集装箱船“SAFMARINE MERU”

轮与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船“NORTHERN JASPER”轮发生碰撞,“SAFMARINE MERU”轮机舱、生活区着火,船上22人随船遇险,情况危急。

东海救助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调派“东海救117”轮、“东海救118”轮、“东海救115”轮、“东海救204”轮以及岸基救助指挥和技术人员先后赶赴现场,一场生与死、火与血的救助就此拉开序幕……

当“东海救118”轮抵达遇险海域时,难船外部的明火已经被先期抵达的“东海救117”轮、“东海救115”轮扑灭,外溢的燃油也被回收清除。但难船内部,尤其是机舱内部仍存在余火与复燃的可能,而且船上还装载有危险货物集装箱。

“快,这里发现一处余火。”

“呼叫118,呼叫118,发现余火,请求……”

“来不及了,快,进行现场灭火。”

没有繁冗的沟通,训练有素的应急队员们合作默契,迅速行动,去甲板灭火,有的找到撬棒清除周边的可燃物品阻止火势蔓延。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余火被扑灭了。

为了圆满完成救助工作,5月11日23时,该局派出岸基救助指挥和技术人员乘“东海救204”轮奔赴救助现场,根据难船的实际情,制定更加科学符合实际的救助方案。

船体破损的“SAFMARINE MERU”轮经不起任何耽搁,体力透支的救助船员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安装拖带索具,为下一步的拖带做好准备。“东海救118”轮在薛志林船长娴熟的操纵下,船尾一点点接近这个庞然大物,并成功完成主拖轮的拖接工作。

在营救难船上的船员后,“东海救118”轮开始缓缓启拖,一场科学指挥、有效配合的团队作战渐渐画上了句号。